

■ 历史研究

蒋介石与抗战后期的国共和谈(1944 – 1945)

刘大禹, 谭棋心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 抗战后期 在赫尔利的居间调停下 ,国共两党围绕合作问题 ,进行了谈判。和谈分歧主要表现为政治上成立“联合政府”还是“参加政府” ,军事上如何整编中共军队。和谈进程中 蒋介石提出组织“战时内阁” ,以囊括中共与其他政党。中共坚持召集“党派会议” ,以实现“联合政府”的政治目标。第三方势力的民盟成为了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 ,地位迅速上升。蒋介石自恃国际环境于己有利 ,缺乏对中共的政治妥协 ,是和谈陷入停顿的重要原因。此次和谈 ,孕育着战后重庆谈判的继续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关键词: 蒋介石; 抗战后期; 国共和谈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7835(2014) 01 – 0116 – 08

Chiang Kai – shek and the Peace Talk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Anti – Japanese War (1944 – 1945)

LIU Da – yu & TAN Qi – xi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Xiangtan 411201 , China)

Abstract: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egotiated on cooperative issues under Patrick Jay Hurley’s mediation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Anti – Japanese War. The major differences of the peace talk were displayed by whether to establish a “coalition government” or a “participatory government” in politics and how to reorganiz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troops in military. During the peace talk , Chiang Kai – shek proposed the organization of a “wartime cabinet” , includ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other parties; however ,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ersisted in convening “party conference” to achieve the political goal of “coalition government”. Therefore , both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re targeting the third force , i. e. the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 whose position got a sharp rise. Chiang Kai – shek assume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as good for him , and he lacked a political compromise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which led the peace talk to be stalled. However , this peace talk bred the continuation of Chongqing negotiation and the opening of the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fter the Anti – Japanese War.

Key words: Chiang Kai – shek;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Anti – Japanese War; the peace talk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① 收稿日期: 2013 – 04 – 05

作者简介: 刘大禹(1972 –) 男 湖南新化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国共关系史研究。

抗战后期，国共两党在合作框架下一直存在冲突。为取得抗战胜利，1944年3月，林伯渠到重庆，与国民党的王世杰、张治中等人进行谈判，未能取得实质进展。9月，赫尔利使华居间调停。针对抗战后期的国共谈判，研究者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第一，运用美国方面的资料，关注赫尔利与国共和谈，分析该阶段美国的对华政策^①。第二，大多使用中共的相关出版物，研究中共对国共和谈态度的主动性^②。

然而，学界对抗战后期国共和谈的解读，尚有三个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一，蒋介石本人对和谈的真实态度如何？第二，国民党方面对和谈是否真的毫无诚意？第三，抗战后期的国共和谈与战后和谈有何关系？笔者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试图探讨蒋介石与抗战后期的国共和谈，以深化战后中国政治走向与国共关系的相关研究。

一 和谈初期蒋介石的态度与国共分歧

抗战中后期，国共两党发生过诸如皖南事变等烈度较大的冲突，在美苏等第三方势力的干预之下，因抗日之需，合作没有公开破裂^[1]。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如何处理相互关系，是双方均需面对的问题。在中共及其民主人士提出政治改革要求的呼声中，1944年1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面见毛泽东，提出派周恩来、朱德和林伯渠赴重庆谈判。毛泽东表示，林、周或可先后赴渝^{[2]493}。拉开了抗战后期国共和谈的序幕。

中共对和谈持积极态度，且希望通过和谈争取第三方势力的支持。1944年4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林伯渠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毛泽东说：“这次总的态度是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想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示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与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感觉我们威胁他们。对中间派主要是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盟。对英、美主要是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2]508}

然而，国民党对和谈并未寄予过多希望。按照陈布雷拟定的《林祖涵来渝应付对策之要点》，“中央之对案，应注重其宣传性，而并不期待其成功”^[3]。蒋介石的态度亦相当明确，“政治方面可酌予放宽一步，但于军事方面之军政、军令与纪律三者，必须坚持绝对之统一，要求其严格遵守，而不容有丝毫违反。”^[4]国民党中央秘书处起草的文件亦谈到：“（1）首先解决军的问题。（2）继则解决政的问题。（3）再则解决党的问题。”^[5]蒋在6月24日日记中所拟的对共方针亦体现了上述观点^③。

从5月开始，林伯渠、王若飞与国民党方面的王世杰、张治中等先后在西安、重庆举行了数次会谈。双方均未就原则问题作出重大让步，和谈暂时中断。

当国共和谈陷入僵局时，1944年9月，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使华，是美国政府试图调解国共争端与主导战后中国政局的尝试。赫尔利通过与国共双方的接触，于10月28日向蒋介石提交一份五点建议案。该案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作出让步，但强调国民党的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整编中共军队，故得到了蒋的认可。蒋保荐赫尔利为驻华大使，并准赫尔利赴延安接洽^④。11月6日，蒋介石与赫尔利会

① 此类成果主要有陶文钊的《赫尔利使华与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确定》（《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牛军的《赫尔利与一九四五年前后的国共谈判》（《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等。

② 从中共角度予以论述的代表性文章有邓野的《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该文认为，1944年5月至1945年2月的国共谈判，是一次中共主导下的、以联合政府为主题的、抗战时期国共最后一次谈判。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由改良转变为革命。另参见邓野著《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6月24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

④ 《蒋介石日记》1944年11月5日。

谈指出其赴延安谈判的条件及应注意各点，“此时务必望其速决”赫尔利表示了同意^①。

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欢迎。8日，毛泽东在与赫尔利的谈话中指出：“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政府。”毛泽东并传递了“在适当时机愿意和蒋先生见面”的信号^{[6]222 225}。经过两天会谈，中共与赫尔利达成五点协议，第二条为其核心，即‘国民政府应即改组为一联合政府，由一切抗日政党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所派代表构成之，并应拟定及颁布一民主政策，就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各事项之改革方案予以规定。军事委员会亦应同时改组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由所有抗日军队派遣代表构成之。’^[7]中共重申和谈目的是改组重庆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保障人权，主张党派平等，军队整编与指挥权亦应采取联合方式。

短短几天，赫尔利居然同意了国共两党大相径庭的两个方案，表现其不了解中国国情或缺乏原则性，但至少证明其并非一味偏袒国民党。11月17日，国民党提交给赫尔利一个反建议案^[8]。该案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未赞成联合政府的主张，坚持整编中共军队，遭到了赫尔利的拒绝。

针对赫尔利的态度，蒋介石责备美国对中共的支持政策。蒋向赫尔利明确中共“参加政府”的方针，“中共代表参加政府不能要求一定职位与人数”，“中共改编为国军，应以十二师为限”。在参加政府之前，“必须先将其军队改编”。赫尔利为促使国共和谈继续进行，不得不声明“必遵照余（蒋）所指示范围进行之”^②。赫尔利对蒋不满，蒋亦认为是美国“袒护中共，无法使之醒悟”^③。

在赫尔利斡旋之下，国共双方重新恢复了接触。11月21日，王世杰与周恩来谈话，在座者为周恩来、董必武、翻译一人、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共六人。周恩来就中共参加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一些问题向王世杰提出了疑问。周作出了让步，表示“不是要变更国民政府称谓，只是要各党派参加政府之组织。至于现有国民政府名称，并不主张改变”。晚餐时，“周、董等举杯谢赫尔利之努力，并庆祝中国之统一。赫尔利也举杯祝中国之统一。”^④同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报告同赫尔利会见的情况。毛泽东在此电上批写“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2]560}毛泽东并不愿意因此而限制中共的发展。

11月22日，周恩来见蒋介石，阐释中共对和谈的态度，力主组建“联合政府”的原则。蒋认为中共有美国的支持，感到周“体态骄肆已不如从前之敬慎矣”，但蒋又认为“共党问题在此时能得到一初步结果，于本党环境亦实有利也。”^⑤蒋介石虽然察觉中共不轻易屈服，但尚希望和谈继续。

随着国民党在抗战后期军事上的不断受挫，中共在和谈中展现的政治态度亦日渐强硬。蒋介石明显感受到了压力，不得不做出一定让步。12月8日，毛泽东同包瑞德会谈时表示“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2]564}12日，毛泽东表示这个解放区的联合委员会暂缓成立，释放了继续和谈的信号。12月19日，蒋与赫尔利谈对共问题，嘱其再约周恩来来渝商谈^⑥。12月28日，周恩来回应赫尔利，若国民政府表示重新合作的决心，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作出具体姿态，而非邀请中共几个人象征性的“参加”政府。

显然，国共两党的初期和谈中，蒋介石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态度，中共根据时局的发展适时调整和

① 《蒋介石日记》1944年11月7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44年11月19日。

③ 《蒋介石日记》1944年11月22日。

④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年1月10日。另见毛泽东致赫尔利将军函（抄件1月11日）（1944年5月—1945年1月国共谈判史料（续）），载《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

⑤ 《蒋介石日记》1944年11月23日。

⑥ 《蒋介石日记》1944年12月19日。

谈策略。双方的分歧主要有三:一是中共军队的整编问题,蒋介石要求中共军队先完成整编,且编制严谨;中共要求双方军队具有同等待遇与联合指挥权。二是组成“联合政府”还是中共“参加”政府,中共要求获得与国民党平等政党地位;国民党试图利用美国调停压迫中共让步,承认国民党的主体地位。三是解决中共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之先后顺序。蒋介石要求先军事后政治,中共力主政治问题优先。不过,中共在坚持“联合政府”之时,并未完全拒绝“参加”政府,亦未要求改变国民党政府之名称,为其后继续和谈留有余地。

二 蒋介石提出的“战时内阁”流产

在和谈进程中,因抗战军事行为的继续,国共双方并未具备解决军队整编的时机。蒋介石改变解决军队然后再谈政治问题的步骤,提出组织一个“战时内阁”,以使中共“参加”政府,推进政党合作,容纳各民主人士,以解决国共问题。之后的和谈即围绕此议题而展开。

1945 年 1 月 2 日,蒋介石与赫尔利会谈。赫尔利认同蒋所主张组织战时行政会议,容纳各党派代表^①。这个战时行政会议,即为“战时内阁”,得到了赫尔利的支持。如蒋所言,“哈雷谈对共方案,彼研究较切且甚诚挚也。”^②1 月 6 日,蒋、赫商谈对共继续谈判方针,“决令彼交子文、雪艇、文白亲飞延安协商,以为最后之试谈,如其能有效,则军事乃可统一指挥,否则其责在彼而不在我,且我已表示诚意,再无其他方法矣。”^③蒋决派大员携战时内阁方案赴延安商谈,但对试谈结果并无把握,考虑到多种可能性,甚至“研究子文到延安是否发生变故或被扣”,“当不至于有此也”^④。

然而,中共并未积极响应蒋提出的战时内阁提议,而是希望以多党派参加的公开谈判方式,共同探讨国是问题,以在国共谈判中化被动为主动。1945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函复赫尔利,予以拒绝蒋的方案,谓以免“徒劳往返”,并说“继续秘密会商为无益之举”。如国民党与中共及民主同盟开“国是会议”,则表示可派周恩来来渝参加此次会议之预备会议^⑤。1945 年 1 月 12 日,赫尔利将此信交给蒋介石。蒋认为,“毛泽东拒绝子文等赴延安商谈,且要求开国是会议,此举实出美国意料之外乎。毛对美国绝望之态度已甚明显也。”^⑥中共态度与其说出乎美国的意外,不如说出乎蒋之意外。王世杰认为,“此一变化又为出政府预料之外。”^⑦因中共表示公开到重庆和谈,对外宣传赢得了先机。

蒋介石对成立战时内阁的意图究竟如何,其他政党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蒋介石提议成立战时内阁,是试图尽量囊括中共及其他政党力量,以给国际社会一个统一的中国形象。这个以委员制形式构成的战时内阁,由王世杰等人起草并提出于国防最高委员会^⑧。1 月 15 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行政院战时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作为行政院决定政策之机关。王世杰提议暂缓对外发表,先向各党派作一度接洽,蒋介石表示赞同。据王世杰记,“午后予与左舜生谈战时政务委员会事,促请中国青年党及国家社会党推荐二人参加,左与中共似有相互默契,颇不赞同单独参加,予严词促其

① 《蒋介石日记》1945 年 1 月 2 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45 年 1 月 5 日。

③ 《蒋介石日记》1945 年 1 月 6 日。另见《王世杰日记》1945 年 1 月 7 日日记。

④ 《蒋介石日记》1945 年 1 月 9 日。

⑤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 年 1 月 10 日。另见毛泽东致赫尔利将军函(抄件 1 月 11 日)(1944 年 5 月—1945 年 1 月国共谈判史料(续)),载《民国档案》1994 年第 3 期。

⑥ 《蒋介石日记》1945 年 1 月 12 日。

⑦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 年 1 月 11 日。

⑧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 年 1 月 14 日,

采取独立立场,……左允考虑再答复。”^①

蒋介石的战时内阁欲成立,必需有其他政党的参与。当中共态度不甚明朗时,如能吸引民盟为主的第三方势力的支持,也有助于树立党派合作的形象,第三方势力在国共和谈中的地位得以凸显。然而,民盟并未遵蒋之意。1月15日,即王、左谈话当日,民盟发表时局宣言,重申“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这个宣言的起草者,正是先为蒋私下召见许以扶持,后又为王世杰严词敦促的左舜生^[9]。对于左舜生的态度,蒋介石相当失望,在日记中言“彼等既合流,则应谋处理之道。”^②1月16日,蒋介石复约王世杰商量战时政务委员会事,仍定“促请中共及中国青年党参加”。当经商定,一面由赫尔利转达延安,一面由王世杰电张群转促李璜考虑^③。

蒋介石的“战时内阁”未能奏效,中共明确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双方意见相左,民盟试图保持中立立场,在国共之间进行调解。1月19日,黄炎培对王世杰谈,黄与左舜生均表示国共问题可由其他党派出任调解。王世杰认为,“中共方面渐欲脱离赫尔利之压迫,故促左等为此表示。”^④在王世杰看来,中共对赫尔利的调停并不满意,希望通过争取国内中间势力,以博取舆情。

事实上,赫尔利的居间和谈调停,国共双方均不满。当赫尔利逐渐倾向国民党后,中共更是对其难以信任。民盟担任调停,国民党自是不便拒绝,且可伺机分化民盟。民盟积极担当调停,亦有其自身考虑:一是可藉此扩大影响,推进中国民主进程;二是与国共有共同政治相交点,民盟由三党三派构成,有倾向国共两党的左右两翼。不过,民盟调解国共问题存在相当难度:一是民盟并无军事势力为后盾,没有维护调解方针的硬实力,大多依赖舆论力量。其二,民盟主要领袖在国民党看来,其态度与中共接近,即使与国民党较为接近且被蒋尊为上宾的左舜生、张君劢等人,均难以为蒋接受。民盟倾向于中立路线,具有民主自由的政治主张,与中共宣传的民主联合政府更易契合,故“战时政务委员会”难以吸纳民盟人员的参与。

围绕“战时内阁”的和谈,双方分歧颇大。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来自延安飞渝,晚间在宋子文宅谈判数小时,无结果。据王世杰记,周恩来表示中共不愿参加国民党党治下之“战时内阁”,欲先召集“各党派会议”,并宣告党治之铲除,成立“联合政府”。王世杰认为周“显然在延宕,无求解决之诚意”^⑤。蒋介石注意到了中共“决无妥协之意思”^⑥。

中共对成立“战时内阁”不妥协,是因与倡导的民主联合政府目标相距甚远。周恩来表示,中共不参加“战时内阁”,并非拒绝这一机构,但需以废除国民党的党治为前提,由各党派共同协商国家政权的组成。1月25日,王世杰、张治中、宋子文及赫尔利会晤周恩来,仍无结果^⑦。周恩来坚持“需要改组国民党军委会”,“联合统帅部应指挥全国军队,而不应是只指挥中共军队”,“中共绝不会把军权交给国民党政府”^[7]。26日,王世杰、张治中复约周恩来商谈。周恩来仍然坚持“惟联合政府必须是铲除党治后之各党派政府”^⑧。

几天会谈,国共双方均未让步。31日,王世杰续与周恩来谈战时内阁问题,周恩来仍然坚持召集“党派会议”之主张。王又与周商谈中共参加国防最高委员会办法,周认为,此须看该会是否有最后决

^①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年1月15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45年1月15日。

^③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年1月16日。

^④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年1月19日。

^⑤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年1月24日。

^⑥ 《蒋介石日记》1945年1月25日。

^⑦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年1月25日。

^⑧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年1月26日。

定权^①。周恩来的意见很明朗,即以多党合作的党派会议作为“共商国是”的前提。

从以上国共和谈不难得知,蒋介石在政治上提出设立“战时内阁”的政府形式,吸纳中共及民盟参加,以给国际社会树立一个和平与统一的中国形象。中共坚持“联合政府”而非“参加政府”,提议召集“党派会议”。中共立场坚定,使蒋较为恼怒^②。蒋不得不继续寻求解决国共问题的途径。

三 “政治协商”的出台

1945 年 1 月的国共和谈,蒋介石提议的“战时内阁”流产。2 月 1 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层约商中共问题,王世杰力陈政府必须以最大之忍耐与努力,求取“政治解决”政策之成功^③。2 日晚间,王世杰续与周恩来谈,对于召集若干国民党以外人员及无党无派人员开会协商一事,彼此已大体同意^④。双方谈判似乎峰回路转。

既然国共双方以政治协商解决国是得以确认,如何召开,成为下一步谈判的焦点。2 月 3 日,王世杰草就协议草案,其内容为召集一十余人之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中共、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民主同盟各派一人至三四人不等,并约其他无党派人士数人参加,商议结束训政,统一军事及容纳国民党以外之人于政府之方案。周恩来允电延安请示。王世杰于午后与张治中面陈蒋介石,“蒋先生以为可行”^⑤。

为何此时蒋介石同意以政治协商解决国是?此与即将召开的雅尔塔会议有关。苏美英三国将于 2 月 4 日召开雅尔塔会议,决定欧战结束后苏联军队对日作战,届时苏军必将进入中国。美、苏为取得战后在中国的发言权,均促国共继续和谈。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在政治上做出一定让步。苏联向中共施加压力,也作出适当妥协。蒋在 2 月 3 日日记中言,“俄国对我态度与舆论之表示转佳,故中共今日之态度亦有顺服就范之意”,“哈雷对子文等直接用压力,要求政府对中共迁就容纳改组联合政府主张,对余则用间接方法表示国共皆无合作诚意之失望”^⑥。

此时,国际舆论对毛泽东赞赏有加,国共和谈气氛较为轻松。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史坦因首次访问毛泽东一文,以“此人有八千六百万人民为其后盾”作显著之标题^⑦。中共对国际形势相当清醒。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认为“在此种情形下,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2]576}。周恩来希望能与国民党方面加强沟通,消除误会。2 月 4 日,王世杰晤周恩来会谈时,周指出国民党对中共的误解。“一,在前年中央发动取消中国共产党运动与蒋先生发行中国之命运一书以前,中共未曾攻击蒋先生。二,欲求政治之解决,蒋先生不宜以中共有些夺取国民党政权之动机为政策之因素,而当以能否造成国共必然合作之环境为决策之标准。”王世杰将此语转陈蒋介石^⑧。毛泽东 2 月 5 日指示周恩来,“对王世杰提案不完全拒绝。”^{[2]577}

然而,政治协商之路并非坦途。中共虽未拒绝王世杰的提案,态度却发生了转变。2 月 9 日,周恩

①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 年 1 月 31 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45 年 1 月反省录。

③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 年 2 月 1 日。另见《蒋介石日记》1945 年 2 月 1 日。

④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 年 2 月 2 日。

⑤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 年 2 月 4 日。王世杰所提为“政治咨询会议”,主张国民党为主体的,中共所提的为“党派会议”,强调国、共、民盟等党派的平等。

⑥ 《蒋介石日记》1945 年 2 月 3 日。

⑦ 照译驻英大使馆 34 年 1 月 30 日来电(情字第 255 号),《美国各报界评论国共关系的情报研究报告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 18 案卷号 2178。

⑧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 年 2 月 4 日。

来说延安对王所草拟之“政治咨询会议”(周恩来原议为党派会议)尚未能接受,但可考虑。并云彼须先返延安一商^①。王世杰将中共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态度变化告知蒋介石。在蒋看来,“与雪艇谈共党态度复变,此与俄国昨来消息相关,为其必然之势也。”^②蒋日记未记录俄国传来何种消息,相关档案亦未找到,但可以推测,苏联或对中共应具有某些暗示。2月10日赫尔利主张周恩来与王世杰发一共同声明,说明谈判现状,周反对^③。至此,国共和谈暂时停顿^④。2月13日,蒋介石见周恩来,“对其共党所主张的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以及余根本方针恳切明示之,并对其提及总理北上为变革革命制度之言予严加斥责,彼自不乐,然予必严正训之,以慰我心。”^⑤

关于和谈受挫的主要责任,王世杰认为,国民党对中共已作数种重大让步,将和谈停顿之责推诿给于中共^⑥。周恩来认为责任应由国民党所负^⑦。王世杰注意到了2月15日周恩来发表的声明,“谓我的声明为欠公允,并谓国民党现不肯立即放弃党治,则行政院为无决定权之机构”^⑧。

当国共和谈停顿时,蒋考虑过单方召开国民大会^⑨,但基于国际压力,不得不继续与中共谋求党际合作。蒋介石注意到雅尔塔会议期间,美苏对中国战后局势的安排,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求蒋对中共妥协。蒋记道:“史(即斯大林,笔者注)对罗谈话大意,我政府须先容纳中共加入政府(即所谓统一),然后方易使中俄合作之实现。”^⑩中共亦受到了苏美的压力,也考虑到了第三方势力的意见。据王世杰记,2月8日晚间,黄炎培邀约周恩来、左舜生、沈钧儒等餐会。黄炎培提出各党“共同训政”之主张,希望民盟与国共取得完全平等的地位^⑪。中共在美苏的压力与民盟的劝说下,据王世杰2月24日记,中共返渝之王若飞说到中共仍在考虑周恩来带回延安之方案,不久当有答复^⑫。

当中共态度转圜时,蒋却考虑在和谈中得陇望蜀,主张“必须军令政令之统一为前提”,“不必希望解决”^⑬。此时的蒋介石自恃国际环境于己有利,未接受“联合政府”的主张,重新强调“军令政令的统一”。1945年3月1日,蒋介石到宪政促进会发表对共产党交涉经过及政府对国是之主张演辞^⑭,态度再次强硬。

蒋介石的这种态度,国民党内外均认为有所不妥。王世杰认为,政府仍须努力以求“政治解决”,其关键则在健全国民党的政治与军事,切实准备宪政以争取第三者之同情与国际之信任^⑮。第三党的左舜生“对蒋先生演词颇有微词”^⑯。中共表示了严重不满。3月13日,王若飞将周恩来用电报拍来之函件面交王世杰,其中就涉及到“对‘政治咨询会议’草案,谓无答复之必要”^⑰,以此作为对蒋介石演讲词

^①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年2月9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9日。

^③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年2月10日。

^④ 《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12日。原文为“与雪艇谈共党交涉,似已停顿”。

^⑤ 《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13日。另见《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14日日记。

^⑥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年2月15日。

^⑦ 周思来声明指出:国共谈判失败的“主要的原因,是国民政府拒绝了我们关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以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改革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政策的建议”。(《解放日报》1945年2月17日)

^⑧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年2月15日。

^⑨ 《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18日。

^⑩ 《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21日。

^⑪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年2月8日。

^⑫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年2月24日。指王世杰所草拟的政治咨询会议方案。

^⑬ 《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25日。

^⑭ 《蒋介石日记》1945年3月1日。

^⑮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年4月2日。

^⑯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年3月1日。

^⑰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1945年3月13日。

的回应。蒋介石又重新产生了武力解决的想法，预定“速拟剿共方案（各战区）”^①。国共和谈在两党分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中暂时中止。

四 结 论

由上所述可知，抗战后期的国共和谈，有国内外多种因素的推波助澜。国共双方谈判一波三折，最后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但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国共和谈虽然表示了整军的前提性，但对政治问题的谈判始终是双方的重点。第二，蒋介石对和谈表现了一定诚意，有时也作出了一定的让步。第三，国共双方态度的转变与美、苏国际压力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关。历经 9 个月的谈判未能产生原则性的纲领，甚至无法发表一个双方认同的共同声明，双方与其试图解决合作问题，不如说更多注重对外宣传，争取于己有利的国际国内支持。

国共两党对军事均高度重视，中共基于革命时期的深刻教训，高度重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自是不会轻易让其军队完全交由蒋介石指挥。如周恩来所言：“要把军权、政权交出去，当然是绝对做不到的事。但是蒋介石还是要你这样做，他说可以给共产党合法，但那是把我们手脚捆起来的合法，手脚捆起来还有什么合法！”^{[10]199} 蒋介石希望通过和谈，限制中共军事力量，而并非真正的政治合作。当蒋自恃国际环境于己有利时，再次萌生武力解决政党纷争的想法。不过，抗战后期的国共和谈虽无文本成果，但“政治协商”的民主方式作为解决政党纠纷的尝试，却在此后扎下了根，孕育着战后重庆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参考文献：

- [1] 刘大禹. 从皖南事变前后看国共合作的困境 [J]. 中共党史研究, 2012(2): 33-41.
- [2] 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中)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 [3] 陈布雷. 林祖涵来渝应付对策之要点 [J]. 民国档案, 1994(2): 44-53.
- [4] 蒋总裁训词关于外籍记者赴延安及林祖涵来渝之准备注意事项 [J]. 民国档案, 1994(2): 44-53.
- [5] 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方案(草案)(中秘处拟)(特件) [J]. 民国档案, 1994(2): 44-53.
- [6]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 [7] 牛 军. 赫尔利与一九四五年前后的国共谈判 [J]. 近代史研究, 1986(1): 188-206.
- [8] 王世杰同周恩来谈话记录 [J]. 民国档案, 1994(3): 18-32.
- [9] 邓 野. 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5): 187-202.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 周恩来自述 [M].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责任校对 谢宜辰)

^① 《蒋介石日记》1945 年 4 月 4 日。